

促进发展，摆脱贫困

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使反贫困计划获得资金支持，
经济发展减少了贫困

Arvind Panagariya

在低收入国家（多数位于南亚和非洲），如果没有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要显著减少贫困，其希望将会非常渺茫。经济快速增长为许多人提供了有利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使得可用于资助反贫困计划的税收收入迅速增加。批评者声称，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而言只是涓滴效应——这一观点忽视了如果没有增长，低收入国家将缺少持续实现重新分配的财政资源这一现实。

自从1950年印度启动国家发展计划以来，该国领导人就一直将减少贫困作为重中之重。然而，几十年来，由于国家贫困和增长非常缓慢，印度的反贫困计划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这样的低收入和缓慢增长，使印度的贫困人口既无法从增长中直接受益（如增加的就业机会），也无法从增长中间接获益（如得到充足资金支持的反贫困计划）。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便将其经济推进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从而使其全部人口迅速脱离了贫困。最近，中国也朝着相同方向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在印度，经过了30年缓慢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一些加速发展之后，反贫困计划终于开始取得初步进展。但是直到又经历二三十年大约6%的年均增长之后，该国才有能力开展农村家庭就业担保计划、有效的教育权利以及食品安全计划等大规模的社会计划。而如果这些计划由于设计不当对增长产生可能的负面后果当然就应当另当别论了。

虽然增长对形成用来资助大规模反贫困计划所需的资源十分关键，但是它对减少贫困的直接贡献也不应被低估。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最近的中国大陆和越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增长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有机会投身于待遇良好的制造业工作。例如，在1965年，9.4%的韩国劳动力受雇于工业部门，在1980年这一比例是21.6%，而同一时期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例从58.6%下降到34%。这一时期平均实际工资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政策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长时，贫困人口得到的帮助就很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通过设置约10万美元（后来修改为25万美元）的投资上限来限制企业对几乎所有劳动密集型产

品（如服装、鞋类、玩具和小型日用品）的生产。这导致了大量效率极低的微型企业的产生，而这些企业在开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广阔国际市场上的能力非常有限。印度玩具从未进入世界市场，而且现在它在美国服装市场上的份额和比它规模小得多的孟加拉国的份额大致相同。虽然这种做法事实上已被废除，但正规部门严格的劳动法规仍然阻止大规模制造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增长是由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密集型部门主导的，这些部门包括汽车、汽车零部件、石油炼制、钢铁、信息技术和制药。这样的结果就是印度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非常缓慢，因此，印度未能充分利用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潜在直接影响。这自然就为反贫困计划设置了更大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计划要求贫困人口留在现有岗位上接受资助，其阻碍了劳动力从农业这样的低生产率部门向其他部门的转移。

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

当面对这样的事实证据，即没有国家能在缺乏增长



巴西布兰基尼亚，人们在卫星天线接受器上晾晒衣服。

的情况下显著减少贫困时，批评者总是将辩论话题转移到不平等上面。他们声称，即使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增长也应该适度以免加剧不平等。当涉及不平等时，要驳倒这些批评者难度就更大了，因为有许多种方法可以衡量不平等，而采用这些方法所衡量的结果不一定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基尼系数（范围是从表示收入完全平等的0到完全不平等的1）来考察增长和国民收入总体分配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重点考察收入最高的5%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5%人口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实际情形可能是（在合理条件下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很大）：即使用前一种方法衡量的结果显示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后一种方法的结果却刚好相反。

不平等也可以通过城乡人均收入差别来衡量。我们还可以关注地区不平等，衡量指标是各州人均收入的差别。此外，还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以及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工人之间工资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举不胜举。

随着经济增长，部分衡量指标显示不平等状况将会恶化，其依据是很充分的。例如，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最富裕的5%人口的收入和最贫穷的5%人口的收入之比几乎必然增大。为实现持续快速增长，那些为数不多的企业家们必须通过合法途径来创造大量财富。而最终，这些企业家也必然会拥有这些财富中的很大比例。毕竟，预见未来能持有自己所创造财富的重大份额是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首要因素。类似地，在增长初期，快速增长经常集中在少数城市区域，这可能会加剧城乡以及地区不平等。

相对财富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会增加不平等程度，而是公民觉得难以忍受的那些不平等的程度是否在提高，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导致一部分人口陷入赤贫的不平等应该遭受谴责，而对此进行的斗争必须优先进行。只要赤贫人口存在，在与最难以忍受的那些不平等的斗争中最大的收获就可能从减少贫困中实现。例如，由于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通过反贫困计划以及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迁移来提高农村地区收入将自动减少城乡不平等。贫困人口通常集中在特定区域，所以将反贫困计划集中在这些地区将降低区域不平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最普遍关注的衡量不平等的指标——针对整个国家或特定地区计算的基尼系数——可能与公民个人对他或她自身福利的感知的相

关度是最差的。如果你询问一位村民他是否了解过去十年他所在的州或国家的基尼系数的变动方向，或者问他过去十年全国或全省基尼系数增加10%是否使他感到不安，你可以确定，他听不懂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正如我在最近访问我的祖先世代居住的村庄时了解到的，村民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他所在村庄的收入没有附近城里人的收入增长得快。当论及不平等时，个体对自己作出评估时参照的环境都是离自己最近的，通常限于邻居、朋友、同事以及附近的城市。

还有最后两点需要说明：

- 首先，不平等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体中肯定更易于被容忍。当自动扶梯上所有人都在向上移动时，其中一些人沿电梯向上走或跑的行为比起自动扶梯停止不动时他们这样做给人们带来的烦恼要少，因为在后种情形下，一些人到达顶部是毫无希望的。

- 其次，如果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财富发生在开放和竞争性的环境中，不平等可以产生激励效应。在1997年，当比尔·盖茨——他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成为亿万富翁——首次访问印度时，他使印度青年敬畏不已。但在时隔十年之后的2007年，当《福布斯》杂志报道了多达54位印度亿万富翁时，很多年轻人对他们自己说：他们与我没什么不同——如果他们做得到，我也做得到！

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跨国企业Wipro公司的董事长，Azim Premji同时也是一位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亿万富翁，但他本人却过着坐经济舱、开丰田车的简朴生活。他在2007年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这样说道：“对于我因财富所引起的关注，我原以为我会成为众人怨憎的对象，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这恰恰激发了许多人心中更大的雄心壮志。”

同样的激励效应也在集体层面上发挥作用。当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迅速发展时，印度的政治家会说：“我们做不到他们做的事；他们是中国人而我们是印度人！”当印度的哈里亚纳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这些地区增长同样迅速时，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再也无法使用同样的借口了。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反思他们所在邦的政策。

大约在不到五年前，印度的新闻媒体充斥着对由于地区不平等加剧而可能随时引发革命的警示。现在，同样的媒体所报道的是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的最高长官如何扭转这些邦的局面，并实现8%—9%的增长率的故事。■

Arvind Panagariya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研究印度政治经济学的Jagdish Bhagwati教授，同时兼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